

社会公平感: 结构与变动趋势 (2006-2017 年)^①

□ 李炜

摘要: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06-2017 年的数据资料, 笔者剖析了中国公众社会公平感及结构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 中国公众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总体评价基本上处于好评区间; 社会公平感的内在结构包括了政治公平、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三个维度; 社会变迁背景下, 不同群体在城乡、教育程度、收入层级、职业等级、社会保险享有、互联网使用等方面形成的公平感存在三个维度上的评价差异, 其变迁走向呈现出总体提升且趋同的态势。

关键词: 社会公平感; 公平感结构;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 06-0110-12

一、问题的缘起: 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分析视角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改革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也随之凸显。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及相关学者的测算, 我国的基尼系数 1978 年为 0.279, 之后逐年上升, 到 2000 年之际突破 0.4 的关口, 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491, 近年逐步回落, 2017 年为 0.467。与之相随, 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诉求日渐强化。笔者统计了 1980 年至 2018 年中国知网学术文献中“社会公平”的主题词分布状况, 并以之与历年基尼系数的变动相比较(图 1)。可以看出: 近 40 年来, 代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学界关注的社会公平议题(即“社会公平”的主题词)大体呈同步增长趋势, 且 21 世纪以来, 学界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度急剧上升, 而这恰恰是基尼系数跨越 0.4 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不平等扩大的社会现实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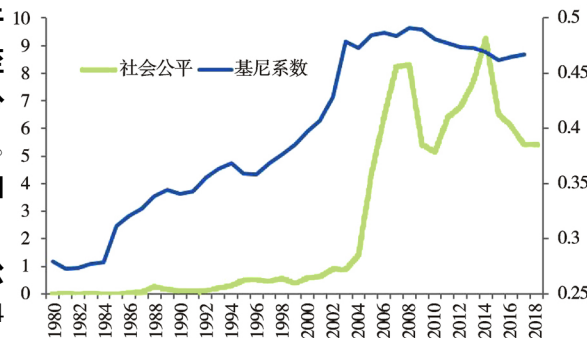


图 1 1980-2018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同期中国学术期刊中社会公平主题词变动趋势

与此同时, 国内以大规模学术性调查为基础的社會公平与公平感研究, 以其规范的研究方法和翔实的经验数据, 深化了学界对上述议题的认识。从现有文献来看, 国内采用大型学术调查研究社会公平感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领域。如马磊和刘欣在 2010 年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GSS) 数据, 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影响因素加以探讨^[1]; 王甫勤也采用 CGSS2005 和“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2008)”数据, 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2]; 李路路、孟天广、胡建国、吴家麟、劳婕、魏钦恭等学者, 都以各类调查数据从类同的“分配公平感”“收入不公感”主题入手, 研究社会公平感问题^{[3][4][5][6][7]}。

聚焦于分配公平感的研究, 对于公平的界定大都采用了亚当斯(J.S. Adams)的“公平法则”。这一

作者简介: 李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16ZDA079) 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7-10

^①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CSS2017)。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执行, 项目主持人为李培林。此项调查 CSS2015-CSS2017 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的资助。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 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法则的要旨,是通过比较自身的投入产出比和其他对象的投入产出比是否相等来判断公平状态^[9]。亚当斯的公平理念就本质而言,是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的参同,有着明显的物质主义和“能力-绩效主义”色彩^[10],即能力禀赋高的个体(群体)终将获得更加优异的社会回报。应该指出的是,亚当斯的“公平法则”源自于组织内公平状况的研究,但若考察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公平感,其适用性就值得商榷,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元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所使用的公平准则不同。改革开放是一场跨领域、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它对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分配公平一隅。当我们研究转型社会中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公平感时,就要进一步厘清不同类型的公平准则及其所适用的社会生活领域。因此,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公众对于社会公平评价中公平准则的类型与构成,即“社会公平感结构”。

二、社会公平感结构研究的文献综述

社会公平感结构的研究,首先要考察前人对社会公平的类型划分。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大作《正义论》中曾提出“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有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它们区别开社会体系中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的方面,一是指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面^[11]”。据此,可以看出罗尔斯这两项正义原则,也可视为社会公平的两种类型,即权利公平和分配公平。

美国心理学家 Gerald S. Leventhal 也划分了不同的社会公平类型。在他看来,人们对公平标准的使用依赖于不同的组织目标:效率、团结和均等。与之相应,分配的公平准则也有三类:(1)贡献准则,即根据投入产出之比来进行分配;(2)需要准则,即以合理的需要为基础进行分配;(3)均等准则,即大家都获得同样的收入而不考虑每个人的投入^[12]。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将社会情境应用到社会正义原则的追求上,形成独具一格的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观。他指出,人类关系的基本模式有三种:工具性联合体、公民身份和团结的社群。除了人们在经济关系中结成的工具性联合体所讲求的绩效公平原则之外,还存在着共同的公民身份的平等公平原则,即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与权益应受到平等、无差别对待;以及作为社会团结的群体关系,满足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的弱者优先的保障公平。人们面对三种关系会相应地采用不同的公平原则:按需分配、能力应得和无差别均等^[13]。

组织学和管理学也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公平和公平感的类型划分。众所周知的便是亚当斯 1965 年提出的“分配公平”的概念,之后 1975 年 Thibaut 和 Walker 提出了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理论,即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所使用的程序、过程的公平性^[14]。1986 年, Bies 和 Moag 指出人际互动关系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即互动公平(Interactive Justice),意指在组织程序的进行当中,个人对人际沟通、人际互动的敏感性^[15]。后来, Greenberg 又将其平分为人际公平(Interpersonal Justice)和信息公平(Informational Justice)^[16],前者是指在执行程序或决定结果时,权威对待下属是否有礼貌、是否考虑对方的尊严、是否尊重对方等;后者指当事人是否被传达了应有的信息,当事人是否得到了一些合情合理的解释。

国内针对公平感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心理测量领域。2003 年刘亚、龙立荣等结合西方学界的组织公平感理论,并加入了中国文化要素,构建了公平感四因素模型,分别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领导公平和领导解释^[17]。张媛 2009 年的研究通过对 692 名 13-27 岁的青少年的量表测试,得出了社会公平感结构的 5 个维度:制度公平、弱势公平、权利公平、互动公平和分配公平^[18]。之后谢雪贤、蒋庆刚分别以部分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为被试进行公平(正)感的测量,谢文将公正感结构划分为分配公正感、程序公正感、机会公正感和互动公正感 4 项^[19],蒋文则得出 6 个公平感结构因子: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机会公平、互动公平、权利公平和弱势公平^[20]。2016 年方雪梅等的研究,通过对 643 位公众的公平感测试,得出了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法律公平、机会公平和地位公平 6 因子的公平感结构^[21]。

通过关于公平感结构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源自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研究的公平类型区分,极具理

论后发意义,为后续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组织学和管理学的公平感类型划分,更多侧重资源分配的程序性而导致的公平感判定。国内对于公平感结构的研究,均体察到分配公平准则的局限,试图将组织学中的公平类型衍化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来测度中国公众的“综合公平感”。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公平感结构的经验研究存在几个缺陷:其一,多元公平的理论吸纳同时也带来公平感结构逻辑的含混。公平准则(什么叫公平)和公平程序(怎样做才公平)的概念分野在量表的测度中被混淆。其二,公平感的测量对象缺乏代表性。大学生群体和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很难说可以代表全体公众。并且这些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也有欠缺不一定能代表青年群体。

借鉴上述已有的研究文献,笔者认为,戴维·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将公平的准则和具体的社会情境相结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因此笔者将其工具性联合体、团结的社群、公民身份三种不同公平模式,对应于社会生活的三个主要领域: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所依据的公平准则是依能力、看绩效;在社会保障领域,所依据的公平准则是保底线、扶弱势;在政治和法律领域,所依据的公平准则是平权利、等身份。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也相应地涵盖了这三个层面,即经济公平、保障公平和政治公平,统称为“社会公平感结构”。

进一步,本文将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2017年5次大型全国调查的数据^①,来剖析十余年期间中国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及其结构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

三、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分析

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至2017年的六次调查中,有五次调查(以下简称CSS2006、CSS2008、CSS2013、CSS2015、CSS2017),采集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信息。其具体提问为,“您认为当前社会下列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共列举了高考制度、公共医疗等14个具体方面,其中有8项是5次调查中都问到的(表1)。另外,还单独询问了受访者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简称为“总体社会公平感”。这些公平感测量的尺度为“1.非常不公平”,“2.不太公平”,“3.比较公平”和“4.非常公平”。单独题目的测量和题目加总测量的结果,都是分值越高表示公平感越强。

表1 中国公众对中国各领域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2006-2017年)

	CSS2006年		CSS2008年		CSS2013年		CSS2015年		CSS2017年		总计	
	I/(%)	排名	I/(%)	排名	I/(%)	排名	I/(%)	排名	I/(%)	排名	I/(%)	排名
高考制度	83.7	1	87.8	1	81.7	1	81.7	1	75.4	1	81.4	1
公共医疗	55.4	4	72.1	3	73.9	2	70.6	2	72.8	2	69.8	2
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70.4	2	73.1	2	58.7	4	63.1	5	63.6	5	64.9	3
司法与执法	64.7	3	61.7	4	57.3	5	64.6	3	65.9	4	62.9	4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42.4	7	55.8	5	63.3	3	63.2	4	66.3	3	59.7	5
工作与就业机会	47.7	5	44.3	6	47.0	6	52.5	6	59.6	6	50.9	6
财富及收入分配	43.9	6	30.0	8	37.0	7	43.1	8	50.3	7	41.4	7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31.7	8	43.6	7	33.9	8	44.1	7	46.3	8	40.4	8
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	66.4		72.8		61.9		68.4		68.9		67.4	

* 公平程度评价是“非常公平”+“比较公平”的百分比

由表1可以看出:(1)十一年来公众的总体社会公平感“非常公平”+“比较公平”的百分比)大致在60%~73%之间,自2006年到2017年的走向是先升(2006-2008年)、后降(2008-2013年),而后再回升的趋势(2013-2017年)。(2)从具体领域公平感来看,公众对高考制度的公平状况评价最高,十一年总计的公平评价为81.4%,说明公众对于教育领域公平状况总体持肯定的态度;对城乡之间的权利/

^① “中国状况综合调查(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2005年发起的一项持续性全国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51个县(市、区)、604个村(居委会),目前为止已完成了十一年的6次调查,累计访问了51828位年满18-69周岁的城乡居民。由于CSS2011中没有全面采集社会公平感的内容,故本文仅以5次调查数据为主。CSS调查的详细内容、抽样设计和调查执行信息请参阅<http://css.cssn.cn>。

待遇的公平评价最低,十一年总计的公平状况评价为 40.4%,在历次调查中也大多位居于末位,表示了公众对社会权利的城乡差距的严重不满。(3) 从各领域公平感变动趋势来看,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待遇方面的公平评价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前者自 2006 年的第四位(55.4%) 提升到 2017 年的第二位(72.8%),提升了 17.4 个百分点;后者自 2006 年的第七位(42.4%) 提升到 2017 年的第三位(66.3%),提升了 23.9 个百分点,体现了人们对政府在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一系列惠民政策的肯定;但另一方面,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公平感知有一定程度下降,其在 2006-2008 年排位较高,名列第二(70.4%和 73.1%),但到 2017 年居于第五位,公平度降至 63.6%;司法与执法方面的公平度先伏后起,自 2006 年的第三位(64.7%) 下降到 2013 年的第五位(57.3%),在 2015-2017 年有了明显回升,达到十一年前的水平“工作与就业机会”的排位变动不大,但也处于上升的态势,自 2006 年的 47.7% 上升至 2017 年的 59.6%,提升了近 12 个百分点;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感知变动较大,2006-2008 年下降了近 14 个百分点,而后自 2013 年起公平感知持续上升,和 2008 年相比,2017 年提升了 20 个百分点,但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公平度相比,还是处于低位。

总而言之,公众对以高考制度为代表的教育领域公平状况的评价相对最高^①,对城乡贫富差距方面的公平状况评价多年来一直较低;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平状况评价有较大提升,政治和公权力方面的公平评价有所下降。

通过计算 CSS 十一年来数据中 8 个领域的社会公平感与总体社会公平感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分领域公平感与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关系强度。由于相关系数是以共变异数为基础的,因此这些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各领域公平感对总体社会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或影响力。从统计结果来看,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司法与执法、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三个领域对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大,其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58、0.456 和 0.455;其次为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0.433)、工作与就业机会(0.412);再次为公共医疗(0.404)、财富及收入分配(0.403) 相应影响较低;影响最弱的是高考制度(0.289) (表 2)。由此可见,真正影响公众对社会总体公平状况感知的,是在社会保障和政治领域,收入分配领域次之,虽然公众对教育领域的公平状况评价甚高,但其对总体社会公平评价的影响却最低。

为厘清上述社会公平感诸方面的内在结构,笔者以因子分析来提炼其类型维度。由于教育领域的高考制度与总体社会公平感的相关系数较低,在这里予以剔除。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最大方差法旋转后,上述 7 个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被化简为 3 个因子(表 3): 因子 1 包括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两项;因子 2 包括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共医疗、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3 项;因子 3 包括财富及收入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两项。至此,笔者完成了对社会公平感的结构提炼,这三个因子分别对应着政治公平(即所有社会成员需被无差别平等对待)、保障公平(即弱者优先的底线公平) 和经济公平(即以能力绩效分配

表 2 各领域社会公平状况评价与总体社会公平评价的相关系数

社会公平评价领域	Pearson 相关系数	样本量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0.458 **	40177
司法与执法	0.456 **	37615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0.455 **	39902
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0.433 **	38871
工作与就业机会	0.412 **	39513
公共医疗	0.404 **	40700
财富及收入分配	0.403 **	40339
高考制度	0.289 **	37912

** 表示统计显著度(Sig.) 小于 0.01。

表 3 社会公平感因子分析结果

	初始成分矩阵			旋转的成分矩阵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	0.665	-0.516	-0.112	0.828	0.114	0.153
司法与执法	0.706	-0.474	-0.083	0.818	0.172	0.178
公共医疗	0.683	0.194	0.119	0.409	0.564	0.184
工作与就业机会	0.678	0.310	-0.467	0.241	0.142	0.834
财富及收入分配	0.679	0.417	-0.317	0.141	0.292	0.794
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0.688	0.183	0.464	0.236	0.800	0.164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0.652	0.292	0.405	0.136	0.773	0.241

^① 教育领域的公平感测量还有“义务教育”,但因其在 CSS2006-2013 年中有调查数据,故本文中缺而未论。“义务教育”的公平状况评价得分尚高于“高考制度”。

收益)。

根据此3类公平因素所对应的公平感题目重新进行分类加总,并转换为百分制,形成政治公平、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三个不同维度的子量表,可见十一年来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中,政治领域的公平感最高(百分制下均值55.99),其次为社会保障领域(均值为51.58),而经济领域公平感最低(均值为46.34)(表4)。公平感结构的三个维度与总体社会公平状况评价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高到低分别为保障公平(0.583)、政治公平(0.513)和经济公平(0.477)。上述结果更加凝炼地展示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结构特征:保障公平是影响公众总体社会公平感最为重要的成分,但其在现实评估中得分居中;政治公平对公众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次之,但其在现实评估中得分最高;经济公平对公众总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弱,在现实评估中得分最低。

表4 公平感结构维度的均值以及与社会总体公平评价的相关系数

公平感结构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与总体公平感的相关系数
政治公平	0.00	100.00	55.99	22.16	36512	0.513**
保障公平	0.00	100.00	51.58	19.08	37705	0.583**
经济公平	0.00	100.00	46.34	21.87	39114	0.477**

**表示统计显著度小于0.01

图2显示了自2006年至2017年社会公平感结构变动的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首先,三类领域的公平感走向不一。政治公平的评价出现较大的波折,2006-2008年公平感处于高峰(57.9和58.0),但到2013年跌至谷底(52.3分),之后又逐步上升到2017年的57.8分,十一年间前后对比,基本持平。而保障公平感和经济公平感基本都处于上升态势:其中保障公平感上升幅度较大,自2006年的44.5分上升至2017年的54.9分;经济公平感曾有一度明显下跌,自2006年的44.5分跌至2008年的40.7分,其可能的原因在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失业状况加剧^①,而后上升至2017年的51.6分。其次,各领域公平感评价差距缩小,有趋同趋势。2006年时三类公平感的得分差异较大,最高的政治公平和最低的保障公平相差13.4分,但到2017年三类公平感的差值缩小到6.2分。这说明公众感知到社会各领域的公平状况变得更为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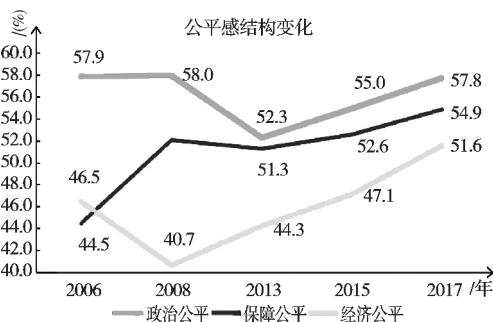


图2 历年来社会公平感结构变动趋势

图3显示了自2006至2017年社会公平感结构对总体社会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保障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一直攀升,2006-2017年由0.535增长到0.644;而政治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则波动较大,在2006-2008年不足0.5,至2013年达到高峰(0.542),但之后又明显降低,2015年为0.496,至2017年又上升至0.528,尚未达到2013年的水平;经济公平的相对重要性则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有大幅的提升,自2008年的0.407上升至2017年的0.527。另外也要看到,和公平感结构变动趋势不同的是,各领域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随时期推移出现了分化而非趋同。换言之,一方面公众对各领域的公平感的重要性都愈加看重,一方面公众对保障公平的重要性尤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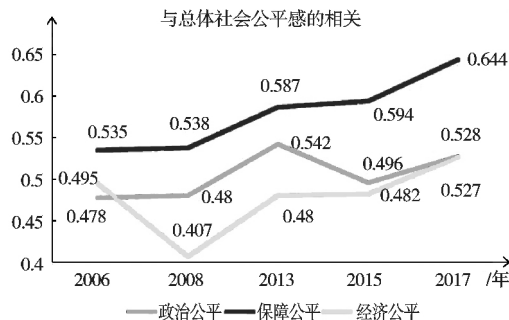


图3 历年来社会公平感结构对总体社会公平感的相对重要性 (Pearson 相关系数)

四、社会公平感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十余年来社会公平感结构变动,是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都会在微观层面上改变公众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机会,同时也改变

① 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又称“社会蓝皮书”)中,曾公布CSS2008的调查报告,当年调查失业率为9.2%。

了人口社会属性结构的变化。例如,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和居住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口结构中的城乡居民占比;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带来公众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也增大了具有高教育经历的成员在总人口中的份额;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逐步扩大,同时也使得享有基本社会福利的社会成员增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造就生活的便利化,同时也意味着网民的规模增加,这些不胜枚举的宏观层面变迁,是否会影响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的结构变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如果与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相对应的微观人口属性的不同分组,其社会公平感存在组间差异,就可以通过时间序列的分析,发现公众公平感的走向和未来趋势。下面将依据 CSS 历年数据,从城镇化、教育程度提升、经济收入增长、职业非农化、社会保险覆盖、互联网普及等多个角度的宏观社会变迁来分析其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结构变动的影响。

(一) 城镇化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6–2017 年,我国的城镇人口由 5.77 亿上升到 8.13 亿,城镇化率由 43.9% 提升到 58.52%。CSS 十一年来的数据表明,随城镇化进程,样本中城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8–69 岁城镇常住居民的占比由 2006 年的 47.4% 上升到 2017 年的 58.5%。CSS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城镇化的加大,并不意味着城镇公众社会公平感的提升,城镇居民在各领域的社会公平感明显弱于乡村居民。从十一年平均来看,以百分

制计,乡村居民对政治公平的评价高出城镇居民 4.5 分(58.5 : 54.0),对保障公平的评价高出 2.2 分(52.8 : 50.6),对经济公平的评价高出 4.3 分(48.7 : 44.4)(表 5)。

从公平感结构趋势变动来看,城乡居民的政治公平感变动不大,但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的上升幅度较大。其中乡村居民的保障公平感在 2006 年是三类公平感中最低的,而在十一年间得到大幅地提升,由 44.6 分上升至 2017 年的 55.7 分,增长约 11 分,充分体现了此期间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获得感;乡村居民的客观经济收入虽然较城镇居民为低,但其经济公平感却自 2008 年的 44.4 分增加至 2017 年的 52.9 分。同期,城镇居民的经济公平感在 2008 年触底,仅为 36.7 分,说明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要明显高于乡村居民,之后则一路攀升,上升到 2017 年的 50.7 分。

目前,城乡居民三方面的社会公平感逐步趋同趋稳,在 50~60 分的区间(图 4)。

上述分析表明,城镇化是造成公平感变动的原因之一。虽然城乡居民的公平感在十一年间普遍提升,但是由于城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普遍低于乡村居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提升,全人口中城镇人口的占比增加,会对社会公平感造成下拉态势。

(二) 教育程度提升

据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2006–2017 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生人数由 2694 万上升至 4297.6 万,年均增长近 6%。CSS 历年数据显示,十一年来公众的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升,样本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自 2006 年的 8.45 年,增长到 2017 年的 9.69 年。同期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自 2006 年的不足 10% 翻番至 2017 年的 20.2%。

统计结果显示,十一年总计,公众对各领域的社会公平评价有明显的随教育程度的增高而递减的态势(表 6)。以政治公平为例,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其公平评价均值是最高的,为 57.4 分,而后是高

表 5 历年来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

城乡	公平感结构	年份					总计
		2006 年	2008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乡村居民	政治公平	59.6	60.2	56.1	57.7	59.3	58.5
	保障公平	44.6	53.6	53.8	54.2	55.7	52.8
	经济公平	50.8	44.4	47.0	48.8	52.9	48.7
城镇居民	政治公平	56.2	55.6	49.1	53.0	56.7	54.0
	保障公平	44.3	50.5	49.1	51.5	54.3	50.6
	经济公平	42.2	36.7	42.0	46.0	50.7	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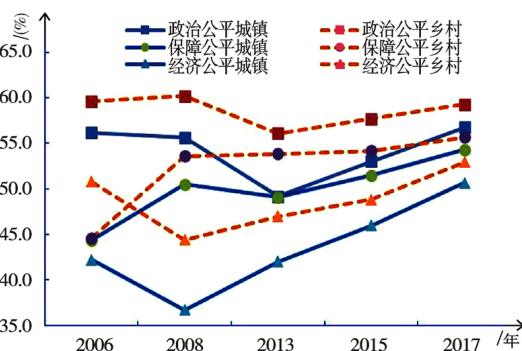


图 4 历年来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中中专教育程度者,为54.4分,最低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为52.9分,最高组和最低组相差4.5分。其余三个领域的公平评价都有同样的趋势。

从公平感结构趋势变动来看,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政治公平感在2006年的起始点比较相近,在55.7~58.6分,在2013年均具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到2017年又恢复到55.8~58.7分。保障公平则起

表6 历年来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

教育程度	公平感结构	年份					总计
		2006年	2008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初中及以下	政治公平	58.6	59.1	54.1	56.6	58.7	57.4
	保障公平	44.3	52.4	52.9	53.4	55.2	52.0
	经济公平	48.1	41.9	45.9	48.0	52.5	47.3
高中中专	政治公平	56.9	55.0	51.5	53.7	55.8	54.4
	保障公平	45.3	51.2	49.8	51.6	53.2	50.6
	经济公平	43.5	37.1	43.0	46.2	49.8	44.6
大专及以上学历	政治公平	55.7	52.5	47.9	51.6	57.2	52.9
	保障公平	44.3	50.1	48.0	51.3	55.7	51.1
	经济公平	41.8	35.8	40.4	45.8	50.9	44.9

点较低,2006年不同教育程度群体均在44分上下,而后大幅上升,到2017年为53.2~55.7分。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经济公平感知在2006年起点的差异最大,最高分的初中及以下组和最低分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组的评分差值达6.3分,而后经2008年的下跌之后持续上升,到2017年逐步趋同,最高分初中及以下组和最低分高中组的评分差值减少到2.7分(图5)。值得说明的是,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越低,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其学理上的解释通常认为,高教育程度者拥有较高的社会期望值,社会批判意识强,因此其社会态度往往不如低教育程度者“积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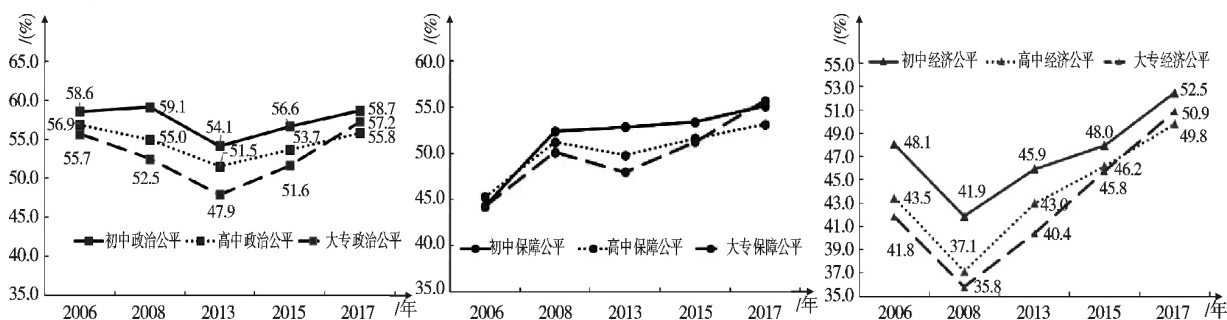


图5 历年来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以上分析说明,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是影响公平感的要素之一。教育程度提高会带来公众社会期望的提升,从而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造成压力。我国目前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者占比不足20%,未来公众的教育程度的提高仍有巨大的空间。因此随着高学历人口的不断增加,亦会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向好态势。

(三) 经济收入增长

2006-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82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733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到2017年分别上升至51261元和24956元,增长了1.8倍和2.4倍。CSS历年数据也显示,以名义收入计,2006年样本中人均年收入为9766元,到2017年为33787元,十一年间个人收入增长了2.46倍。收入增长带来了社会公平感的提升吗?

统计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各领域的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关系并非正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负向结果(图6)。按人均收入5等分划分的不同群体中,收入最低20%的群体在政治、保障、经济三个领域的公平感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8.8、52.9和47.6分,而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的公平感分数几乎是最底的,分别为53.1、50.7和46.3。以政治公平为例,最低收入群体的评价分值为58.8分,中低收入群体评价分值为58.0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值为56.1分,中高收入群体为54.6分,最高收入群体则为53.1分,最高组和最低组的评价分值相差5.7分。

从变动趋势上来看,政治公平感方面各收入群体在2006年的起始点相差不大,在56~60分,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各收入组的政治公平感出现分化,特别是在 2013-2017 年,分化愈加明显。2017 年最低收入组的政治公平感高达 63.3 分,而最高收入组则分数最低,其最低分仅为 54.1 分,还不及 2006 年的水平。中高收入组也有同样的状况(图 7、表 7)。为何政治公平感会随着收入程度的提升而下降,而且在十余年中出现分化的趋势?笔者认为这可能和同时期中、高收入群体的地位认同下降有关。CSS 历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最高 20% 收入组认为自己属于中上或上等地位的比例,由 2006 年 25.6% 大幅下降到 2017 年的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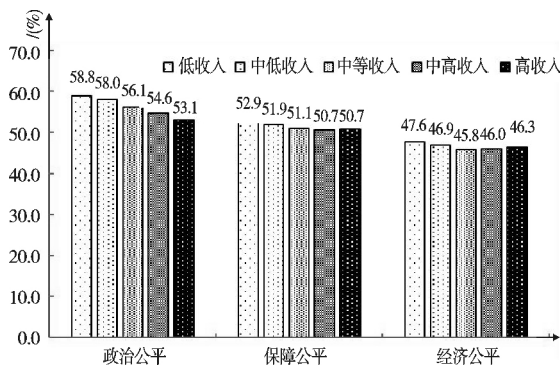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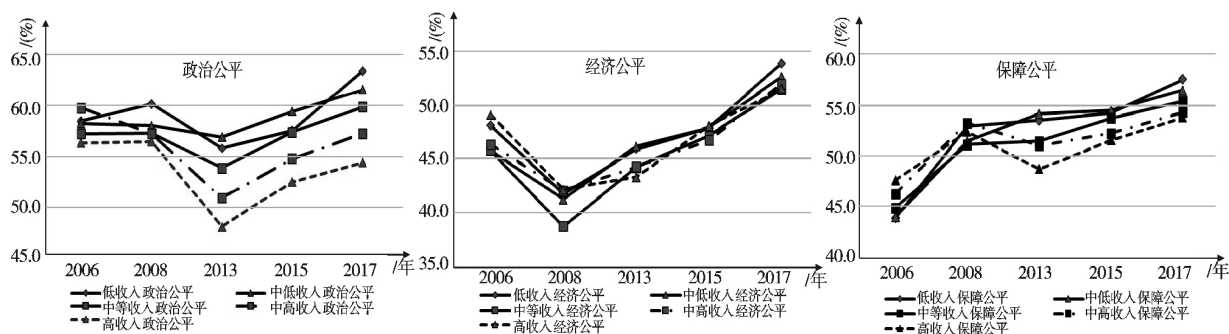


图7 历年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趋势

在经济公平方面,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别相对不大,且显现处较为一致的趋势。自 2008 年之后各收入群体一路向好,且呈现趋同的态势。保障公平也是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高收入群体的公平感出现波动,2008-2013 年有所下降,为各组最低,而后也逐步提升,并与各组趋同(图 7、表 7)。

(四) 职业非农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职业结构趋高级化,体现在大量的农业劳动者进城务工,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大幅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2006-2017 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从

表7 历年不同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

个人收入分组	公平感结构	年份					总计
		2006 年	2008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最低 20% 收入组	政治公平	58.3	60.0	55.6	57.3	63.3	58.7
	保障公平	43.9	52.9	53.4	54.1	57.4	51.5
	经济公平	48.0	41.8	45.9	47.8	53.7	46.8
中低 20% 收入组	政治公平	58.0	57.8	56.7	59.3	61.4	58.4
	保障公平	44.0	51.4	54.0	54.4	56.3	50.8
	经济公平	45.7	41.3	46.1	47.8	52.5	45.8
中等 20% 收入组	政治公平	57.0	57.1	53.6	57.2	59.7	56.8
	保障公平	44.9	51.0	51.4	53.6	55.3	51.0
	经济公平	45.7	38.8	44.2	47.1	51.4	45.0
中高 20% 收入组	政治公平	59.6	57.0	50.6	54.5	57.1	54.7
	保障公平	46.3	53.2	51.0	52.1	54.2	52.2
	经济公平	46.3	42.1	44.2	46.7	51.8	47.0
最高 20% 收入组	政治公平	56.1	56.2	47.7	52.2	54.1	52.2
	保障公平	47.6	52.3	48.7	51.5	53.7	51.6
	经济公平	49.0	42.2	43.3	48.0	51.4	47.8

42.6%、25.2%和32.2% 变动为 27.0%、28.1% 和44.9%,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下降了 15.6 个百分点^①。在 CSS 调查的 2006-2017 年十一年间,农业劳动者在 18-69 岁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占比自 50.6% 下降到 35.8%,降低了 14.8 个百分点。白领人员(包括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三类)从 14.2% 上升到 21.8%,蓝领人员(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占比从 35.2% 上升至 42.4%。

CSS 历年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职业群体中农民对各领域的社会公平评价最高,而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几乎没有差异(图 8)。以政治公平为例,农民的公平评价分为 59.5 分,而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的分值在 53 分左右;以保障公平为例,农民的公平评价均值为 53.1 分,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均值在 50~

① 由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职业信息仅在普查年公布,因此此处的职业变动比较,国家统计局数据以产业从业人员变动来近似替代。

51 分;经济公平感也是如此的状况。农民对社会公平状况的高评价,和前面我们所展示的乡村居民、低教育程度者的社会评价特征是相吻合的。

从变动趋势上来看,政治公平感方面,各职业群体的变动趋势与收入群体的状况类似,也是在 2006 年的起始点相差不大,在 56~60 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群体间的政治公平感出现分化,农民的公平感提升加快,其得分到 2017 年高达 62.2 分;白领则自 2006 年的 56.9 分跌至 2013 年的 48.6 分,然后上升到 2017 年的 57.0 分,基本和初期持平;而蓝领则出现下降趋势,得分从 2006 年的 57.4 分下降到 2017 年 53.7 分。至 2017 年,政治公平感在各职业群体间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 8.5 分(表 8、图 9)。

保障公平感方面,各职业群体也出现了普遍提升过程中的分化趋势。在 2006 年的起始点,各职业群体的得分都处于最低点 45 分上下且非常近似,而后在 2008 年之后,农业劳动者的公平感逐步上升,到 2017 年达到 56.8 分;白领和蓝领则在 2013 年度下降到 48.5~49.6 分,而后逐渐上升至 2017 年的 55.1 分和 52.7 分。经济公平方面的变迁趋势则由差异转向趋同:2006 年农民的公平感得分明显高于白领和蓝领,为 51.7 分,而后再经 2008 年的谷底再度上升,到 2017 年达到 54.8 分;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则甚为类似,其起点得分都较低,不足 45 分,而后经 2008 年的低端较快幅度上升至 2017 年的 52.6 和 51.0 分(表 8、图 9)。上述分析结果表明,职业非农化对社会公平感结构的影响特征,在政治公平方面类似于收入群体的分化加大趋势,在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方面,则与教育程度的趋同趋势类似。

表 8 历年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

职业	公平感结构	年份					总计
		2006 年	2008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白领	政治公平	56.9	55.9	48.6	52.0	57.0	53.6
	保障公平	45.0	52.6	48.5	51.1	55.1	51.0
	经济公平	44.7	40.2	42.0	46.6	52.6	46.1
蓝领	政治公平	57.4	56.7	50.0	52.0	53.7	53.5
	保障公平	45.0	51.0	49.6	51.3	52.7	50.3
	经济公平	44.9	38.8	43.8	46.6	51.0	45.4
农民	政治公平	59.2	60.7	56.7	59.0	62.2	59.5
	保障公平	44.5	53.6	55.0	54.6	56.8	53.1
	经济公平	51.7	45.3	47.6	49.4	54.8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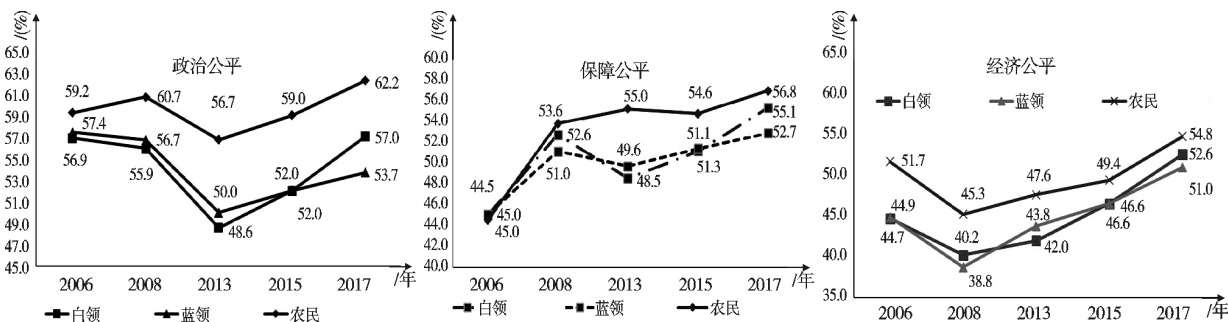


图 9 历年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五) 社会保险覆盖

近年来社会保障不断推进,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6 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 1.12 亿,2017 年增长至 1.88 亿;同期 2006 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1.80 亿,至 2017 年增长至 3.03 亿。CSS 历年数据也显示,拥有各类社会保险^①的人数在 18-69 岁人口中的占比由 2008 年^②的 84.7% 上升至 2017 年的 91.7%。

① CSS 中的社会保险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 5 项。本文中享有任何一项社会保险的都记为“享有”。

② CSS2006 中没有询问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因此从 2008 年算起。

CSS 历年数据统计表明,是否享有社会保险对社会公平感有一定影响。无论是政治公平,还是保障和经济公平,享有社会保险者比未享有者的评价都略高。其中政治公平方面,社会保险享有者的评分比未享有者高出 2.5 分(56:53.5),保障公平方面,社会保险享有者比未享有者高 1.7 分,经济公平方面社保享有者比未享有者高出 2.2 分(图 10)。

从变动趋势上来看,享有社会保险与否的群体间政治公平感的评价,也是社会保险享有者比未享有者的得分要高 3~4 分,且历年差距保持均衡,呈现平行态势;保障公平方面,略有趋同趋势,即由 2008 年起始点两个群体的得分差异 3.7 分,缩小到 2017 年的 1.3 分。经济公平方面,趋同趋势则更加明显:2008 年社会保险享有者比未享有者得分高出近 6.7 分,到 2015-2017 年则几乎没有差距(图 11)。以上分析表明,社会保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知。今后随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享有社会保障的人口增多,会在总体上有助于公众公平感的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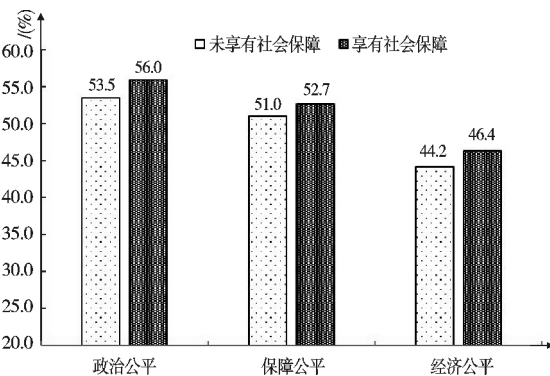


图 10 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群体的公平感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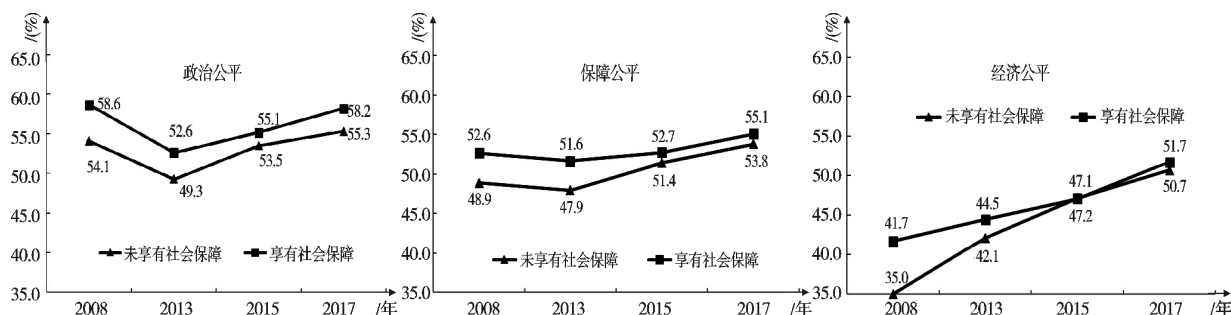


图 11 历年是否享有社会保障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六) 互联网普及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在国内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大亮点。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表明,2006-2017 年,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由 1.37 亿上升至 5.13 亿,增加了 2.7 倍。CSS 历年数据也显示,互联网用户在 18-69 岁人口中的占比,自 2008 年的 21% 快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50.4%^①。

CSS 历年的统计结果显示,互联网的应用对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网民和非网民相比,政治公平感方面的差异最大,超过了 6 分(58.6:52.3),其次为保障公平,相差 2.4 分(53.9:51.5),在经济公平上相差近 1 分(图 12)。

从变动趋势上来看,在政治公平方面,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评价不低但差异明显,在时间序列上一直呈平行变动态势,网民一直比非网民要高出 6~7 分;在经济公平方面,网民与非网民出现了分化趋势,即在 2008 年的起始点得分相近,但之后不断扩大差异,到 2017 年相差 3 分左右;在经济公平方面,网民与非网民之间也呈现平行态势,虽然经济公平的感知持续上升,但两个群体之间一直相差 3 分左右(图 13)。以上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是历年来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十年来,网民与非网民社会公平感的评分差距一直呈现或平行或分化的态势,目前尚未有趋同的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世界所折射的社会图景和社会现实状况的差异。互联网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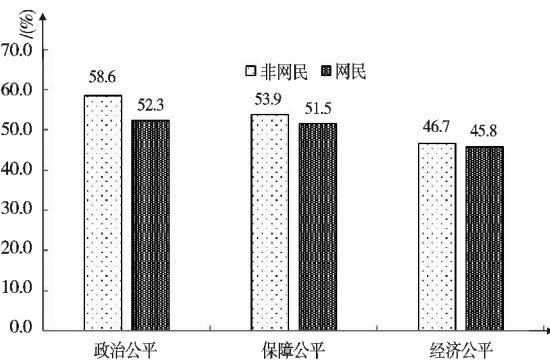


图 12 是否使用互联网群体的公平感结构

^① CSS2006 中没有询问有关互联网的内容,因此从 2008 年算起。另,由于 CSS 的样本人群年龄区间为 18-69 岁,18 岁以下的大量互联网用户未纳入统计,因此对互联网用户在全人口中占比有所低估。

在未来仍然会持续增长,其所带来的社会公平感的负向效应值得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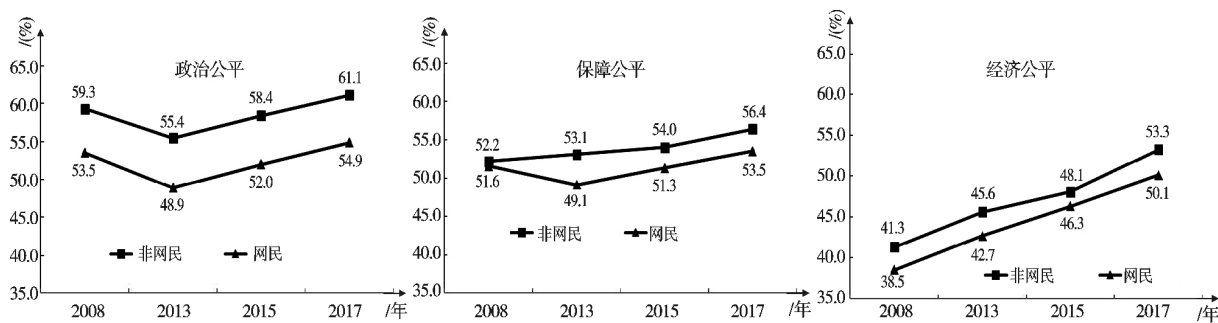


图 13 历年是否使用互联网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结构及变动

五、结论

2006-2017 年,公众的总体社会公平感基本呈提升趋势,基本上处于好评区间,即 60%~70% 的公众认为当前社会状况是公平的。从公平感的得分来看,公众对教育领域的公平状况评价相对最高,对政治和公权力方面的评分较高但趋势上有所下降,对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平状况评价得分居中但有较大提升,对贫富差距方面的公平感知得分多年来一直处于低分段。若从公平感的重要性来看,真正影响公众对社会总体公平状况感知的,是在社会保障和政治领域,收入分配领域次之,教育领域的公平状况得分虽高,但其对总体社会公平评价的影响权重不是最重要的。

公众在各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可以结构化为政治公平、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三个层面,对应着平权、扶弱、尚能三种不同的社会公平准则。从得分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政治公平感、保障公平感和经济公平感;从对总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力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保障公平感、政治公平感和经济公平感。这说明公众对十余年来社会公平状况的感知,其内涵主要是在社会保障和政治领域,即社会保障和政治领域的公平感受更能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总体评价。相比而言,经济状况仅对经济领域的公平感知发生作用,对总体社会公平感知的作用稍弱。这也印证了分配公平的准则不能作为普遍的社会公平感的依据。

在城镇化、教育程度提升、经济收入增长、职业非农化、社会保险覆盖扩大、互联网普及等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对应微观层面,公众在城乡、教育程度、收入层级、职业等级、社会保险享有、互联网使用等方面形成的不同群体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大致而言,乡村居民身份、较低教育程度者、中低收入者、农民、社会保险享有者、非网民等群体,有着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他们大多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而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其社会公平评价较低,他们多是城镇居民,中高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在中等以上,从事各种非农职业,使用互联网的人群。这就出现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宏观层面的趋势向好,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造就了规模巨大的中高端社会地位群体,但另一方面这些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却相对较低。从未来走向看,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平感的提升。这意味着宏观社会变迁对微观层面个体公平感的影响的传导机制是甚为复杂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公众对于社会公平的期望的提升幅度要高于客观社会状况改善的速率。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公众拥有更丰富而多元的社会信息来升级社会公平感知的比较参照系。因此,宏观层面社会变迁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作用机制应该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主题。

从时间序列视角和群体比较视角考察的社会变迁趋势,主要看升降和趋同、分化、平行三种态势走向之间的组合模式。对社会公平感而言,上升自然比下降更有利于社会的治理;趋同走向则反映出社会群体间的共识易于产生,平行走向则表明社会群体间的观点难以靠近,分化则意味着社会分歧的加剧。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十一年间社会公平感结构的变动,具体领域的公平感在各群体之间有其不同的变动走向。城乡之间比较,政治公平、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的感知存在较大差异,但趋势是在提升中趋同;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在三类公平感知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趋势也是在提升中趋同;经济收入不同的人群在政治公平上呈现提升但分化的趋势,但在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方面呈现相互间差距不大

的平行上升态势;职业群体中,在政治公平、保障公平方面都出现了提升而分化的态势,在经济公平上有趋同的特征。社会保障的拥有与否,在政治公平感知上出现明显的有差距的平行变动态势,而在保障公平、经济公平方面的感知在上升中趋同。最后,互联网的使用产生了最明显的平行世界、网民和非网民间,对三个领域的社会公平感知,在提升中或平行或分化。从总体社会公平感来看,虽然在2006年初始点,公众在政治公平、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三方面的感知评分相差较大,但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出现了持续上升且趋同的态势,特别是保障公平和经济公平的感知提升幅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保障、经济三领域走向均衡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 [2] 王甫勤《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载《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版。
- [3]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 [4]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载《社会》2012年第6期。
- [5] 胡建国《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中国公众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再探讨》,载《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
- [6] 吴家麟《当代中国收入分配的宏观公平感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版。
- [7] 劳婕《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定量分析》,载《求索》2013年第11期。
- [8] 魏钦恭《发展进程中的“双重印象”: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公平感研究》,载《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
- [9] 亚当斯、罗森鲍姆《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薛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10] 罗归国《科学的发展观呼唤全面的公平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3期。
- [1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12] G.S. Leventhal. “The distribution of rewards and resources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In L. Berkowitz & W. Walster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91-131.
- [13]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14] J.A. Colquitt. “O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Vol.86.
- [15] R.J. Bies, J.F. Moag. “Interaction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In Roy, J. Lewicki, Max, H. Bazerman (Ed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s in Organizations*, England: JAI Press Inc., 1986, P.43-55.
- [16] Jerald Greenberg.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fairnes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6, Vol.71(2).
- [17] 刘亚、龙立荣、李晔《组织公平感对组织效果变量的影响》,载《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
- [18] 张媛《中国青少年社会公平感的结构与测量》,载《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
- [19] 谢雪贤《大学生社会公正感、对富人的偏见及相关变量的关系研究》,载《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版。
- [20] 蒋庆刚《大学生社会公平感的结构和测量——以南昌市大学生为例》,载《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版。
- [21] 方雪梅、陈松《我国公民社会公正感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The Sense of Social Fairness: Structure and Trend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Public Social Fairness between 2006 and 2017

LI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06-2017 data of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end of social public fairness and its 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is basically in the positive rang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ocial fairness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political fairness, guarantee fairness and economic fairnes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hange, there ar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education, income, occupation, social insurance enjoyment and Internet use and so on. The change trend shows an overall improvement and convergence trend.

Key words: social fairness; fairness structure; social change

责任编辑 吴兰丽